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LA NOTION DE L'AUTORITE

# 权威的概念

[法国]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著 姜志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LA NOTION DE L'AUTORITE

# 权威的概念

[法国]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著 姜志辉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威的概念 / (法) 科耶夫著; 姜志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1

(凤凰文库. 人文与社会系列)

ISBN 978-7-5447-1590-4

I. ①权… II. ①科… ②姜… III. ①权威-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606号

---

La notion de l'autorité by Alexandre Kojève

Copyright © 2004 by Editions Gallima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8-231 号

---

书 名 权威的概念

著 者 [法国]亚历山大·科耶夫

译 者 姜志辉

责任编辑 江 蕾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97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90-4

定 价 21.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滴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 译者的话

科耶夫(1902—1968)的原名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后来,当他在法国讲解黑格尔哲学的时候,包括其学生在内的一些听众都叫他科耶夫,“科耶夫尼科夫”因此就简化为“科耶夫”。科耶夫出生于俄国的一个富裕家庭,青年时代经历过一段动荡的生活,之后去德国的海德堡和柏林求学。在卡尔·雅斯贝斯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关于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耶夫(Vladimir Soloviev)人和神在基督教中合二为一思想的博士论文。在科耶夫去世后出版的《论异教哲学思想史》(*Essai d'une histoire raisonnée de la philosophie païenne*, 第一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1968;第二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1972;第三卷:《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1973)讨论的就是哲学和神学冲突的问题,并且涉及索洛维耶夫。在求学期间,对他产生影响的学者包括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科学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1933年至1939年,他接替科瓦雷在高等应用学校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参加听课的有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雅克·拉康、安德烈·布勒东、乔治·巴塔耶、雷蒙·格诺,他们深受其具有震撼力的讲解的影响。作家

雷蒙·格诺整理了他的听课笔记,经过科耶夫的亲自审阅,在1947年交给伽俐玛出版社出版,这就是使科耶夫成为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代表的《黑格尔导读》(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科耶夫以其特有的方式讲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尤其是把黑格尔的承认概念和主人—奴隶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他对《精神现象学》的阐释直到60年代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耶夫作为欧洲共同市场,也就是欧洲共同体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法国经济事务部工作,直至去世,在实践上致力于“普遍的和同质的国家”的建立。

《权威的概念》是科耶夫在1942年撰写的一部手稿。该手稿存放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直到被管理员发现后,才由弗朗索瓦·特雷进行校订和整理,于2004年由法国伽俐玛出版社出版。这是最新出版的一部科耶夫著作。该书是一本小书,也可以说是一个“纲要”,与科耶夫在1943年撰写、在他死后于1981年才出版的《法权现象学纲要》(*Esquisse d'une phénoménologie du droit*)有着紧密的联系。按照本书编者弗朗索瓦·特雷在其前言中的说法:“这部手稿从现象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角度补充了已经出版的科耶夫在法学、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在《权威的概念》中,科耶夫提出了一种权威类型学,认为存在着四种纯粹的、不可还原的权威:父亲的权威(经院哲学家的理论),主人的权威(黑格尔的理论),领袖的权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及法官的权威(柏拉图的理论)。在科耶夫之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提出过四种权威或统治形式:法理型权威——建立在明文规定的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建立在对具有特殊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崇拜基础上的权威,传统型权威——基于习俗力量或源于自然的亲缘关系的权威,以上三种权威类型是基本的,而个人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则构成了第四种权威——封建型权威。我们可



以发现,科耶夫提出的四种权威与韦伯的上述四种权威或统治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尽管他们两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权威类型的。“法官的权威”对应于“法理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对应于“领袖的权威”,“父亲的权威”对应于“传统型权威”,以及“封建型权威”对应于“主人的权威”。但两者的区别在于韦伯的着重点是经济和政治统治形式之间的关系。比如,韦伯认为,个人魅力型权威是反经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考虑经济因素,在其极端形式中,个人魅力型权威敌视所有形式的经济活动;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建立在法理型统治形式之上,并且依靠现代官僚行政机构;传统型权威和封建型权威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两种权威中的专制成分与理性资本主义不相容;另一方面,它们对资金有需求,因而鼓励商业资本主义。而在科耶夫那里,他更多关注法权和哲学思想史,把经济因素排斥在外,试图演绎出纯粹理论的权威类型及其组合。他使用现象学的方法,从假定存在的事实出发,得出一般的权威理论。这就是作为思想家的科耶夫和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之间的差异。

科耶夫在《权威的概念》的开篇说道:“关于权威的概念的研究,哪怕是临时性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必然先于关于国家问题的任何研究。”虽然自1942年以来,在权威的主题方面,哲学思考已经有所进展,但是科耶夫对于权威本质的研究可谓是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因为权威是权力的基础,任何一种统治形式都需要某种强制性力量,也就是权威来维护。如果不知道权威本身是什么,那么显然不可能讨论国家的政权和结构本身。由此可见,科耶夫最近问世的这本纲要式小书,在政治学和哲学领域,并非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译本难免存在着错误,如读者提出中肯的批评,本人将不胜荣幸。

## 前 言

弗朗索瓦·特雷

亚力山大·科耶夫对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生活经历是令人感兴趣的。他于1902年出生在俄国,1919年或1920年离开苏维埃国家,前往柏林,二十年代的柏林是布莱希特和印象主义的时代。当魏玛共和国的情况开始恶化的时候,他于1926年来到处在动荡年代的巴黎。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不仅工作难找,而且一片萧条。他同意以教授哲学谋生。其间,他研究了“基督教和佛教伦理的最终目的”,并于193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无神论”的论文。他对东方哲学十分感兴趣,进而学习梵文、汉文和藏文……1926年,他完成了关于索洛维耶夫的博士论文答辩。

为了生计和报答友谊,在亚力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请求下,他接替科瓦雷在高等应用学校的课程。和在他之前许多其他并非等闲之辈的哲学教师一样,他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着手逐字逐句讲解《精神现象学》。这个课程首先吸引了一群小范围的听众,然后吸引了许多被深深打动的听众,这些学生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有: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埃里克·韦伊(Eric Weil)、罗伯尔·马约兰(Robert Marjolin)、加斯

东·费萨尔(Gaston Fessar)、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雷蒙·波兰(Raymond Polin)、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还有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48年,雷蒙·格诺根据收集到的科耶夫的课程笔记,出版了《黑格尔导读》。科耶夫的教学与绘声绘色的表演手法结合在一起。雷蒙·阿隆提到他的“才华”和“辩证技巧”,他说:“有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当他在1938年或1939年自称是‘严格遵守信条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时候,他的话是出自内心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话在何种意义上是出自内心的?”<sup>①</sup>人们马上会提及一个事实:科耶夫“私下里”并不否认俄国是由野蛮人统治的。雷蒙·阿隆接着说:“我还要问:在他那里是怎样的表演手法,是精神的表演手法还是存在的表演手法?”<sup>②</sup>

科耶夫的思想阐明了重新回到黑格尔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尤其自1945年以来,这个阶段标志着“首字母为H的三个人(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那一代的大多数先导者”,以及在“虚无的人性化”的意义上与“反抗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的退隐”同时产生的东西。<sup>③</sup>而人们在后来观察到的思想的盛衰,并不重要。后来的发展证明,黑格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一个必要阶段,即使在拒绝接受黑格尔思想的人看来。因此,不管是否忠实于黑格尔——然而,这样的忠实意味着什么?——在扩展理性的威望方面,科耶夫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樊尚·德贡布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按照定义,一种力求做到

---

① 《回忆录》,巴黎,Julliard出版社,1983年,96页。

② 同上,99页。

③ 樊尚·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法国哲学的四十五年》,巴黎,Minut出版社,1979年,21—22页。参见乔治奥·巴尔贝利(Giorgio Barberis),《自由王国:亚力山大·科耶夫思想中的法学、政治和历史》(*Il regno della libertà. Diritto, politica e storia nel pensiero di Alexandre Kojève*),那不勒斯,Liguori出版社,2003年。

辩证的思想在于把理性运动引向本质上异己的东西,引向不同的东西:因此,整个问题在于弄清在这个运动中不同的东西是否被归结为相同的东西,或者为了同时涵盖理性和非理性、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理性是否应该发生变化和丧失其最初的一同性,不再是相同的东西,不再与不同的东西保持不同。”<sup>①</sup>因此,理性的必要阶段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偏离的,在通向智慧的道路上,需要通过犬儒主义、暴力和恐怖,科耶夫认为,在那里,哲学家和暴君是同伙,甚至一起行动。他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这种内在目的论,这种目的论能指导否定性的辩证运动,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本身。<sup>②</sup>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一个观点:当历史的矛盾最终被解决的时候,历史的终结就来到了。在黑格尔关于主人和奴隶——仆人?侍从?——的著名辩证法之上,添加了历史终结的理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

1807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胜利之后的那一年,黑格尔出版了《精神现象学》。这一年标志着历史上激动人心的年代,把基于最终的知识、在某些人看来能导致存在的运动,和一种永恒的运动,即证明其整体性的一种体系的运动,区分开来。1821年,黑格尔出版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法哲学原理》。一百二十二年之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处在最激烈的时候,科耶夫撰写了《法权现象学纲要》,他在加入法国籍之后,随即应征入伍,参加宣而不战的奇怪战争。但是,在1940年,和其他士兵一样,他与自己的军团失散。1940年,他置身于所谓的“自由”区,尼娜·伊凡诺夫在那里与他重聚,尽管她没有法国护照。当他们住在马赛的时候,

---

<sup>①</sup> 樊尚·德贡布,《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25页。

<sup>②</sup> 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启蒙者科耶夫”,《黑格尔和〈精神现象学〉》,见于《文学杂志》,1991年11月,52页。

他们遇到了列昂·波里亚科夫,原籍俄国的犹太人,与让·卡苏的战斗小组有联系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sup>①</sup>科耶夫积极地参与抵抗运动。长期以来,科耶夫知道死亡的危险,由于这种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他后来把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加以具体化。<sup>②</sup>在洛特省的格拉马,他去看望埃里克·韦伊一家,他和尼娜·伊凡诺夫住在一家小旅馆里,1943年夏天,他就在那里撰写《法权现象学纲要》。他于1968年去世,在他死后十三年,这部奠基性著作才问世。<sup>③</sup>这部著作引起了许多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极大兴趣,对我们时代的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它详尽地探讨了法权。科耶夫解决了长期以来内在于法权定义的谜团,他在这个问题上引入了一种决定性的分析,重新思考和超越了价值的唯一依附物,而关于形式结构的沉思仅仅在自身中寻找价值的根源、本质和解释。在这部著作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面对分析哲学的泛滥,它依然是无可指摘的,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和超越法权在与事实的关系方面,以及作为从现实到理性和从理性到现实的固有的这种循环性的两重性。

科耶夫考察法权的定义,考察能使我们分辨、区分和认识法权的东西——长期以来,法学家发现它是模棱两可的最棘手问题。在科耶夫看来,就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而言,法权现象学必然意味着一个无偏向的和公正的第三者的干预。这个第三者有各种不同的职能,他是立法者、法官或警察,尤其是因为他作为以法律人(juridique)自居的法官进行干预。不过,这个第三者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在人身上有一种主持公正的愿望,甚至有一种裁决的快乐,和性的快乐或审美的快乐一样,裁决的

---

① 多米尼克·奥弗莱(Dominique Auffret),《亚力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和历史的终结》,巴黎,Grasset出版社,1990年,267页及以下,尤其参见270页;列昂·波里亚科夫(Léon Poliakov),《回忆录》,巴黎,Jacques Grancher出版社,1999年,尤其参见167页。

② 同上,271页。

③ 《法权现象学纲要》,巴黎,Galimard出版社,《思想文库》,1981年。“纲要”这个说法也适用于今天出版的著作。

快乐也是特定的。在人身上,有一种本义的司法兴趣,它是属于个人的,受到公正观念的启发。在科耶夫看来,正如在黑格尔看来,劳动行为必须以另一个劳动行为为前提,因为经济人通常也是爱虚荣的人,他渴望获得承认,这是自我意识的条件本身,他从裁决的意识出发,继以被裁决的意识。因此,在一方面的法律人和另一方面的宗教人、道德人、经济人和政治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分。换句话说,如果观念的发展仍然是科耶夫的法权哲学的核心,那么从此以后,问题的关键是公正的观念,而不是黑格尔的自由的观念。

在《法权现象学纲要》中,权威的问题并没有被忽视。当然,科耶夫是从“家庭社会的法权”方面来考察权威的。在《法权现象学纲要》第499页的注释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评语:“参见我的《关于权威的说明》(关于家庭领域的补充)(在国家中,主人的权威看来体现在对外政策中,体现在与敌人的关系中;领袖的权威看来体现在对内政策中,体现在与朋友的关系中)。”此外,在著作的内容中,有一个重要的段落,它标志着在科耶夫的思想中法权现象学和权威——更确切地说,权威的各种类型——之间存在的联系:“在家庭中,人们求助于存在的权威,而不是求助于行动的权威。”<sup>①</sup>

他补充说:“不过,存在的权威,就是‘父亲’类型的权威:存在的东西的原因、起因、根源和起源的权威;过去的权威只是由于存在的本体论‘惰性’而持续到现在。在政治领域里,(现在的)行动权威以及(将来的)计划权威,即‘主人’和‘奴隶’类型的权威,是第一位的。相反,在家庭领域里,第一位的权威,基本的权威,是(过去的)‘父亲’类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永恒’的权威,即无偏向的权威),(进行预测和指导的)领袖与(作出决定和行动的)主人的权威源于(产生存在和确保等同于他自己的过去的永恒的)父亲的权威。相反,在国家中,父亲(和法官的)权威源于

---

<sup>①</sup> 《法权现象学纲要》,498页。

主人和领袖的权威(最初的主人的权威)。在这里,人们仍然能看到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种本质差异。一方面,亲属不是反对一个共同敌人的朋友;另一方面,亲属不是承认主人和统治者的权威的被统治者。亲属根据他们的亲族关系的等级而互爱,亲属尤其爱他们的共同祖先,爱他们的老祖宗,爱他们的存在的根源和起源,他们把一种肯定的价值给予其存在的根源和起源。他们之所以承认一种权威(这种权威给予他们一种政治统一性的外表,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统一性),是因为他们承认这位‘亲属’的父亲权威,这种存在的父亲权威同样得到非家族成员的承认:例如,奴隶、仆人,等等,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有其他的家族。因此,家族中的家庭组织与国家中的政治组织截然不同:根据决定其存在的亲族关系,亲属能(通过爱或通过权威)服从亲属,但是,严格地说,亲属不是被亲属统治的。”<sup>①</sup>

这些段落证实了《关于权威的说明》的时间,《关于权威的说明》的撰写先于《法权现象学纲要》的说明,尽管这个说明偶尔参照《关于法权的说明》(59页),甚至参照《关于国家的特别说明》(137页)。在后来以《法权现象学纲要》的书名出版的打字原稿中,第一页有“马赛,1943年”的字样,而在《权威的概念》的最后一页,末尾署名:“亚力山大·科耶夫尼科夫,马赛,16/V42”。在这个日期之后的五个月,盟军在北非登陆(1942年9月9日),德军占领“自由”区。要到1943年初,冯·保卢斯(Von Paulus)才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它在时间上更接近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在1942年6月22日的著名演说,赖伐尔在演说中“希望德国能胜利,因为如果德国败北,那么在明天,到处都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人们不仅仅期待《法权现象学纲要》的出版,而且也期待《权威的概念》的出版。多米尼克·奥弗莱(Dominique Auffret)已经提及《权威的概念》

---

<sup>①</sup> 《法权现象学纲要》,498页。

念》，他指出，它“还不为人所知”。手稿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后来叫做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室里。现在，《权威的概念》的问世要归功于手稿室的主任，佛罗伦萨·德·卢西(Florence de Lussy)的幸运发现，手稿是尼娜·伊凡诺夫赠与的科耶夫的未出版著作。这部手稿从现象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角度补充了已经出版的科耶夫在法学、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从撰写手稿的1942年到现在，科耶夫已经在建立一个没有行政等级的欧洲的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与有天赋的对话者之一列奥·施特劳斯进行争论的时候，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了成果。列奥·施特劳斯出版了关于色诺芬的对话的注释：《论暴政》<sup>①</sup>；1954年，该书的法译本问世，附有科耶夫的一篇批判性论文：《暴政与智慧》。在那些想知道科耶夫为什么要继续进行他的主要研究的人看来，这篇论文是重要的，他认为，历史是由哲学家引导的一系列政治行动，而哲学家本身得到了“精神仲裁者”的帮助。

科耶夫把他的专著叫做《权威的概念》。他一上来就指责说：“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权威的问题和概念很少得到研究。”接着，他补充说：“人们主要探讨与权威的转变及其起源有关的问题。但是，这个现象的本质几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如果不知道权威本身是什么，那么显然不可能讨论国家的政权和结构本身。因此，关于权威的概念的研究，哪怕是临时性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必然先于关于国家问题的任何研究。”联系到他在写这几行文字时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尤其联系到在独裁和特别状态的问题上反驳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争论，<sup>②</sup>科耶夫在卷首的指责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在1942年和本书目前出版之间，在权威的主题方面，哲学思考已经有

① 列奥·施特劳斯的《论暴政》在1948年出版。——译注

② 尤其参见乔治奥·阿岗本(Giorgio Agamben)，《特别状态：可恶的人》，巴黎，Seuil出版社，2003年，特别是56页及以下和89页及以下。



了进展,包括科耶夫在世的年代。除了那些仅仅以周边的方式涉及这个问题,乃至探讨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提某些能阐明问题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时代错误已经被克服,科耶夫的研究仍然是奠基性的。

\*

首先是因为这些研究阐明了和充实了社会学发展的成就。<sup>①</sup>社会学的发展在于证明传统权威的崩溃,以前的制度——例如,作为政权和人民之间的中间组织的行会、公社、教会或家庭——的衰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区别显露出来了,其中,(社会)权威符合保守主义者的感情,甚至合乎激进主义者和中间团体的感情,而(政治)权力是基础,其模式源于法国大革命,并通过法国大革命源于启蒙运动,尤其源于卢梭,反对存在于国家之内的“局部性联盟”。以回归共同体为标志的时代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围绕着在权威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威的地位和作用的一条分界线,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从迪尔凯姆到齐美尔和许多其他人。权威在大工业中的自然延续已经得到恩格斯的肯定。<sup>②</sup>在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官僚主义起着重要作用。以国家、集体和个体的整合为基础的三角关系,在统治和服从、上级和下级之间关系的循环性……人们仍然根据权威与非权威的区分,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不是权威的东西,即权威的反面来认识权威。因此,科耶夫的方法是重要的。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以后的一些分析,尤其是汉娜·阿伦特的分析。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972年被译成法文,取名为《什么是权

---

① 参见尼斯贝(Robert A. Nisbet),《社会学的传统》,巴黎,PUF出版社,第三版,“Quadrige”丛书,2000年。

② 参见《论权威》(1874年),尼斯贝,《社会学的传统》,178页。